

数字经济驱动下数据资产管理的影响因素

○ 鄂尔多斯市发展研究中心 贾宇虹

摘要：在数字经济成为经济增长新动能的背景下，数据资产的有效管理对于组织核心竞争力塑造至关重要。构建“政策-技术-组织-管理”四维分析框架，系统分析数据资产管理的关键影响因素。结果表明：相关法规为数据资产管理提供制度边界与合规导向(政策层面)；先进技术支撑数据的存储、处理与安全防护(技术层面)；合理的架构设计和协同模式影响管理效率(组织层面)；科学的流程与策略决定数据资产价值的挖掘程度(管理层面)。企业开展数据资产管理必须聚焦合规性与运营效率，通过技术落地与组织协同挖掘数据的商业价值；政府开展数据资产管理需要兼顾公共服务与安全，以数据开放共享与跨部门协同提升社会治理效能。因此，通过系统性优化路径提升了数据资产管理水平，助力组织在数字经济浪潮中获取竞争优势。

关键词：数字经济；数据资产管理；影响因素；优化路径

中图分类号：F49；F275；F810

一、引言

在数字经济蓬勃发展的当下，数据已跃升为核心生产要素，数据资产的有效管理对企业和国家的竞争力塑造至关重要。数字经济的发展，催生出海量数据，如何妥善管理海量数据资产、挖掘数据资产潜在价值，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从企业角度看，精准的客户数据，能够助力市场营销精准定位、提升销售转化率；从政府的视角出发，高效的数据资产管理，可优化公共服务、增强社会治理效能。现有研究，虽然对数据资产管理有所涉及，但在构建全面系统的分析框架及深入分析各因素交互影响方面仍有欠缺。因此，本研究构建“政策-技术-组织-管理”四维分析框架，旨在全面剖析数据资产管理的影响因素，并提出针对性的优化路径，为理论研究与实践应用提供参考。

二、数字经济与数据资产管理概述

(一) 数字经济的内涵与发展态势

数字经济是以数字化知识和信息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以数字技术为核心驱动力，以现代信息网络为重要载体，通过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

融合，不断提高传统产业数字化和智能化水平，加速重构经济发展与政府治理模式的新型经济形态^[1]。近年来，随着全球数字经济规模持续扩张，2023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达53.9万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例为42.8%，数字经济展现出强劲的发展活力^[2]。数字经济增长得益于5G、人工智能和区块链等先进数字技术的突破与广泛应用，推动了各行业数字化转型的加速推进，创造诸多新业态和新模式。

(二) 数据资产管理的重要性

数据资产管理是指规划、控制和提供数据及信息资产的一组业务职能，主要涵盖开发、执行和监督有关数据的计划、政策、方案、项目、流程、方法和程序等，主旨在控制、保护、交付和提升数据资产价值^[3]。在数字经济环境下，数据资产管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对企业而言，一方面，高质量的数据资产为企业决策提供精准依据，提升决策的科学性与时效性。如电商企业通过分析消费者浏览、购买数据，能精准洞察市场需求，优化商品选择与营销策略。另一方面，企业有效管理数据资产，可优化业务流程、降低运营成本和提升运营效率。同时，数据资产作为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关键组成部

作者简介：贾宇虹(1995—)，鄂尔多斯市发展研究中心，中级会计师。研究方向：数字经济、碳会计。

分,能驱动企业产品与服务创新,开拓新市场、创造新价值。

对政府而言,数据资产管理是提升政府治理能力与公共服务水平的核心支撑。其一,政务数据的系统化管理打破了部门数据壁垒,实现跨层级、跨地域、跨系统的数据流通与共享^[4]。如整合市场监管、税务、社保等部门的数据资产,可构建企业全生命周期监管体系,精准识别违法违规行为,提升市场治理效能。其二,高质量的公共数据资产为政策制定提供科学依据,减少决策盲目性。如交通运输部门通过分析道路通行、公共交通流量等数据,能够精准规划公交线路、优化交通信号配时,缓解城市拥堵。其三,政府主导的数据资产开放与运营,能激活社会创新活力。如将气象、地理、公共交通等非涉密数据向社会开放,可推动相关企业开发出智慧出行、农业物联网等创新应用项目,带动数字经济相关产业发展,形成“数据赋能-产业升级-经济增长”的良性循环^[5]。此外,数据资产的安全管理是政府维护国家安全与社会公共利益的重要保障,建立完善的数据安全防护体系,能有效防范数据泄露、滥用等风险,守护公众隐私与国家数据主权^[6]。

三、“政策-技术-组织-管理”框架下,数据资产管理的影响因素

(一)政策因素

1. 数据相关法律法规的约束与引导

近年来,随着数据安全和隐私保护问题日益凸显,各国纷纷加强数据领域立法。我国相继出台《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法律法规,明确数据处理活动边界,保障数据安全与个人信息权益^[7]。企业在数据资产管理过程中,必须严格遵循相关法律法规,否则将面临巨额罚款与声誉损害风险。因此,促使企业强化数据安全与隐私保护措施,规范数据资产管理流程,如在数据收集阶段确保合规授权,在存储环节加强加密防护。政府在数据资产管理中,不仅要严格遵循相关法律法规开展数据收集、存储、使用等工作,还肩负着监督企业和其他组织合规运营的重任。网信、公安等部门定期开展数据安全专项检查,对违规处理数据的企业进行处罚,督促企业强化数据安全与隐私保护措施,规范数据资产管理流程。

2. 政策支持与鼓励措施

为推动数字经济发展,培育数据要素市场,政府出台多项支持鼓励政策。2023年12月,财政部颁布《关于加强数据资产管理的指导意见》(财资[2023]141号),从制度层面为数据资产管理提供支撑^[8]。各地也积极探索(如浙江、湖南等省份发布数据资产管理相关文件、工作指南与政策方案),推进了地方单位数据资产管理标准化。部分城市搭建数据资产交易平台,促进数据资产流通交易,优化资源配置。政府对数据资产管理相关技术研发和创新应用给予资金扶持与税收优惠政策,降低企业投入成本,激发企业参与数据资产管理的积极性,引导企业加大在数据治理、数据分析等方面的投入,提升数据资产管理水平。如对参与数据安全技术研发的企业给予专项研发资金补贴,对符合条件的数据资产管理创新项目减免税收。

(二)技术因素

1. 数据存储与处理技术的支撑

数据量的爆发式增长对存储与处理技术提出更高要求。分布式存储技术,通过将数据分散存储于多个节点,提升存储可靠性与扩展性,可应对海量数据存储需求。如某省政务云采用分布式存储架构,保障了全省人口普查数据的大规模安全存储。政府部门不断优化数据处理框架,利用Apache Hadoop的MapReduce分布式计算框架将任务分解至多节点并行处理,显著提升处理效率。如税务部门运用该技术快速处理海量的纳税申报数据。云存储,凭借便捷访问与灵活计费优势,降低企业数据存储成本;如地方政府的档案管理部门采用云存储保存历史政务文件。

2. 数据分析与挖掘技术的赋能

数据分析与挖掘技术助力政府及企业从海量数据中提取关键信息。数据挖掘算法(包括分类算法(决策树、朴素贝叶斯)、聚类算法(K-Means))能够发现数据模式与规律^[9]。电商企业借助聚类算法对客户进行分类,实施个性化营销策略;民政部门借助聚类算法对困难群众进行分类,实施精准救助。随着机器学习、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日益广泛,机器学习模型依据历史数据训练并预测未来趋势。利用时间序列分析模型预测城市交通流量变化,为交通管理部门制定疏导方案提供科学依据;深度学习在图像识别、自然语言处理领域表现卓越,为企业处理非结构化数据

提供了有力工具；公安部门利用图像识别技术进行安防监控；政府智能客服利用自然语言处理技术解答民众咨询，提升公共服务质量与效率。因此，挖掘数据潜在价值，推动了数据资产价值的落地实现。

3. 数据安全技术保障

数据安全是数据资产管理的生命线。数据加密技术保障数据传输与存储安全，安全套接层-传输层安全(SSL-TLS)加密协议在网络通信中被广泛应用。如政府在电子政务外网与互联网之间设置安全隔离，并采用加密技术保障数据传输安全。在访问控制方面，政府依据身份的访问控制(RBAC)模型，为用户身份分配权限，确保数据访问安全(如政府部门的不同岗位人员对政务数据拥有不同的操作权限)；数据备份与恢复技术为数据安全提供兜底保障，一般采用全量与增量备份相结合的方式，减少备份时间与空间占用，确保数据在遭遇灾难或损坏时可快速恢复，防止数据丢失，维护数据资产完整性与可用性。

(三) 组织因素

1. 战略与数据资产管理的协同

战略对数据资产管理具有引领作用，而数据资产管理也为战略实施提供关键支撑，形成双向协同的良性循环。企业若将数字化转型作为核心战略，必然强化对数据资产管理的重视并加大资源投入。互联网企业制定数据驱动创新发展战略，专门设立数据资产管理部门，将数据资产深度融入企业整体战略规划，与业务战略紧密结合，通过数据分析持续优化产品设计与用户体验推动企业业务增长。精准、及时的数据资产能助力企业洞察市场动态，掌握竞争对手情况，为企业战略决策提供可靠依据。如企业在计划拓展新市场时，通过市场与用户数据分析评估市场潜力与风险，保障决策的科学性。对政府而言，随着数字政府建设的推进，当地方政府将数据驱动的治理模式确立为核心战略，同样会聚焦数据资产管理并增加投入。例如，政府制定数字政府建设3年行动计划，设立数据管理局，将数据资产管理纳入政府整体战略框架，并与政务服务、社会治理等业务战略深度融合，借助数据分析优化公共服务流程，提升政府社会治理效能。高质量的数据资产能够帮助政府洞察社会动态和民生需求，为战略决策提供支撑。如政府在制定城市发展规划时，通过人口、经济、环境等多维度数据分析，评估

城市发展潜力与风险防范，确保决策的科学性。

2. 数据管理组织架构与职责分工

科学的组织架构是数据资产管理的核心保障。国家实行层级化、专业化的组织架构为数据资产管理提供了系统性支撑。国家层面，国家数据局的设立实现了对数字中国、数字经济、数字社会规划与建设的统筹推进，规范了全国数据资产的管理方向。地方政府层面，各地相继成立数据管理局、大数据发展局等专职机构，聚焦本地区数据资产的统筹协调、标准制定与安全监管，形成上下联动的治理体系。企业层面，大型组织普遍设立首席数据官(CDO)岗位及专职团队，专职团队主要包括数据治理小组(负责制定全流程管理规范与政策)、数据质量小组(专注于数据全生命周期的质量监控与优化)和数据安全小组(聚焦风险防控与合规管理)，三者协同构建闭环管理机制^[10]。跨部门协同是组织架构高效运转的关键。业务部门作为数据的“生产者”与“使用者”，精准反馈实际需求；技术部门承担技术选型、平台搭建与运维支持；财政或财务部门深度参与数据资产的价值评估与成本效益分析，并且各部门形成“需求-技术-价值”的联动链条。例如，在企业客户数据管理中，业务部门明确用户画像分析需求，技术部门通过算法模型实现数据挖掘，财务部门测算管理成本与商业价值，多环节协同保障数据资产从产生到应用的全生命周期价值最大化^[11]；在政府疫情防控场景中，卫生健康部门提出流调数据采集需求，工业和信息化部门依托技术平台实现多源数据整合分析，财政部门保障数据系统建设与运维资金，跨部门协作支撑了疫情数据的实时更新与精准应用，彰显了组织架构在特殊场景下的高效应对能力。

(四) 管理因素

1. 数据质量管理流程与标准

数据质量是数据资产价值的基础。需建立完善的数据质量管理流程，主要涵盖数据采集、存储、处理、分析的全流程监控与评估。数据采集阶段，明确数据来源与采集标准，确保数据的准确性与完整性；存储环节，规范数据格式与存储结构，保障数据一致性；处理过程，建立数据清洗与校验机制，去除错误与重复数据。同时制定数据质量评估标准(如数据准确性、完整性、一致性、时效性等指标)，定期评估数据质量，发现问题及时整改。通过持续优化数据质量管理流

程与标准,提升数据资产质量,为数据价值挖掘奠定基础。例如,国家统计局会定期对统计数据质量进行抽查,对数据质量不达标的地区进行通报批评。因此,通过持续优化数据质量管理流程与标准,提升数据资产质量,为政府决策和公共服务提供可靠数据支持。

2. 数据资产价值评估与运营策略

科学评估数据资产价值是企业有效运营的前提。企业可采用成本法、市场法、收益法等多种方法评估数据资产价值。成本法,依据数据采集、存储、处理成本进行评估;市场法参考市场上类似数据资产的交易价格;收益法,根据数据资产未来预期收益的折现计算价值。在评估基础上,制定数据资产运营策略。对于高价值数据资产,加大开发利用力度,通过数据共享、交易实现价值最大化;对低价值数据资产,进行清理或优化,降低管理成本。同时,关注数据资产市场动态,适时调整运营策略,提升数据资产运营效益。

四、数据资产管理优化路径

数据资产管理的优化需兼顾企业与政府双主体的特性,结合各自场景形成系统性路径,通过政策响应、技术创新、组织协同与管理升级等实现效能提升。

(一) 强化政策响应与合规管理

企业需动态跟踪国家与地方数据政策法规,设立专职合规的部门或岗位,负责政策解读与流程适配,确保数据收集、存储、使用全流程合规。定期开展全员合规培训,将数据安全与隐私保护要求嵌入业务环节;建立项目全生命周期合规审查机制,及时规避法律风险,同时积极争取政府资金扶持与税收优惠,降低数据管理投入成本。政府强化政策执行与监管能力,通过专题培训、官方解读等方式确保公职人员掌握数据法规要求,规范政务数据处理行为;建立企业数据合规常态化检查机制,对违规行为依法惩戒;同时依托上级财政专项(如数字经济发展资金)加强政务数据平台建设,提升跨部门数据协同效率。

(二) 技术创新与技术应用升级

企业需持续加大技术研发投入,通过产学研合作突破数据存储、处理、安全等核心技术瓶颈,引进培育复合型技术人才。关注区块链、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的场景落地,利用区块链实现数据确权与溯源,借助 AI 技术提升数据清洗、分析的

自动化水平;定期评估现有技术体系,淘汰老化工具,确保技术栈与业务需求的适配性,为数据资产价值挖掘提供支撑。政府需加大公共数据技术研发投入,设立专项基金支持数据安全、隐私计算等关键技术攻关,推动高校、科研机构与企业联合攻关。在政务场景中落地新技术,利用区块链实现政务数据溯源,通过 AI 技术自动化处理社保、税务等海量数据;定期评估技术适配性,淘汰落后系统,保障政务数据处理的高效与安全。

(三) 组织架构优化与协同机制完善

企业依据战略调整数据管理架构,明确首席数据官(CDO)统筹职能,细化数据治理、质量、安全等专项小组的职责边界。建立跨部门协调机制,促进业务部门(需求输出)、技术部门(技术落地)、财务部门(价值评估)的协同联动。例如,在客户数据管理中,通过“需求-技术-成本”的闭环协作实现全生命周期管理,打破“数据孤岛”。根据数字政府建设需求,优化数据管理机构设置(如数据管理局),明确部门职责以避免交叉管理。建立跨部门数据共享协调机制,强化数据管理部门与业务部门(如卫生健康、工业和信息化)的协作。例如,政府要求各部门按月提交数据供需清单,推动人口、交通等政务数据的流通融合;在国家疫情防控中,实现数据需求快速响应与资源高效调配。

(四) 管理流程精细化与策略科学化

企业必须构建全流程数据质量管理体系,明确采集、存储、处理各环节的质量指标与责任主体,应用六西格玛管理策略工具持续优化数据,保证数据的准确性与一致性。完善价值评估模型,综合成本、收益与市场需求制定差异化运营策略,对高增值潜力数据(如核心客户画像)加大开发投入力度,对低价值数据及时清理,以提升数据资产周转效率。政府需要细化政务数据质量管理流程,明确采集标准与校验规则,引入先进技术工具提升数据质量;构建兼顾成本与社会效益的价值评估体系,对公共服务价值高的数据(如交通流量、气象数据)加大开放力度,对具备经济价值的政务数据探索市场化运营模式(如政府向导航企业开放交通数据),兼顾公众服务与数据资产增值。

五、结论

数字经济时代,数据资产管理已成为提升企

业市场竞争力和政府治理能力的核心依据。通过“政策-技术-组织-管理”四维框架分析表明,政策法规为管理活动提供制度边界并提供发展支撑;技术创新是提升数据资产管理效率的基础保障;合理的组织架构与协同机制确保数据资产管理流程顺畅推进;科学的管理策略与运营方法决定数据资产价值的释放程度。企业开展数据资产管理必须聚焦合规性与运营效率,通过技术落地与组织协同挖掘数据的商业价值;政府开展数据资产管理需要兼顾公共服务与安全,以数据开放共享与跨部门协同提升社会治理效能。企业和政府应用场景,虽然存在差异,但均需通过系统性的优化路径和动态适配数字经济发展的需求。因此,随着数据要素市场化改革的深入推进,数据资产管理的精细化、智能化水平将持续提升,已成为驱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动力。

参考文献:

- [1]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 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 2020 年[R]. 北京: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 2020.
- [2]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 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研究报告: 2024 年[R]. 北京: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 2024.
- [3] [美] DAMA INTERNATIONAL. DAMA 数据管理知识体系指南[M]. 2 版. 上海市静安区国际数据管理协会, 译. 北京: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8.
- [4] 国务院. 政务数据共享条例: 国务院令 第 809 号[EB/OL]. (2025-05-28) [2026-01-15] http://www.gov.cn/gongbao/2025/issue_12106/202506/content_7028417.html.
- [5] 沈坤荣, 林剑威. 链“岛”成“陆”: 公共数据开放的技术创新效应研究[J]. 管理世界, 2025, 41(2): 83-104.
- [6] 郝志超, 龚汉卿. 2022 年全球网络空间安全动态综述[J]. 中国电子科学研究院学报, 2023, 18(4): 392-396.
- [7] 张继红. 国家安全视域下我国数据安全法的制度构造[J]. 西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3): 96-103.
- [8] 财政部. 财政部资产管理司有关负责人就印发《关于加强数据资产管理的指导意见》答记者问[J]. 财务与会计, 2024(3): 4-5.
- [9] 谭章禄, 王美君. 智慧矿山数据治理概念内涵、发展目标与关键技术[J]. 工矿自动化, 2022, 48(5): 6-14.
- [10] 张舰. 数字经济时代企业数据资产管理与研究[J]. 财会学习, 2021(24): 149-154.
- [11] 徐涛, 尤建新, 曾彩霞, 等. 企业数据资产化实践探索与理论模型构建[J]. 外国经济与管理, 2022, 44(6): 3-17.
- [7] 李清, 陈琳. ESG 评级不确定性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J]. 管理学报, 2024, 21(12): 1820-1829.
- [8] 胡耘通, 冉佳灵. ESG 评级对审计影响的研究现状及展望[J]. 会计之友, 2024(18): 104-111.
- [9] 陈洪涛, 何任翔, 王彬龙. 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对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 来自上市公司的证据[J]. 生态经济, 2023, 39(5): 173-179.
- [10] 王希胜, 陈馥妍. 环境信息披露研究热点及其演化[J]. 生态经济, 2024, 40(1): 221-229.
- [11] 许金花, 商丽霞, 代雨萌. 环境信息的绿色治理功能: 基于重污染企业绿色并购数据[J]. 产经评论, 2023, 14(4): 92-110.
- [12] 于敏. 企业环境会计信息披露质量问题研究[J]. 会计之友(下旬刊), 2006(5): 76-78.
- [13] 欧阳莹, 韩士金, 唐卞. 复杂多模态情境下环境会计信息挖掘与高质量披露探索: 基于数智融合型信息分析方法的应用[J]. 财会通讯, 2025(3): 141-146.
- [14] 沈剑飞, 李婧婕. “双碳”目标下企业环境会计信息披露质量对企业价值的影响研究: 基于电力企业实证分析[J]. 武汉金融, 2022(4): 55-63.
- [15] 赵选民, 杨梦琳. 环境会计信息披露质量与公司治理结构关系研究: 基于资源型企业的数据分析[J]. 中国注册会计师, 2016(8): 45-49.
- [16] 黄溶冰, 储芳. 第三方鉴证是否有助于抑制企业“漂绿”[J]. 中国注册会计师, 2021(8): 38-42.
- [17] 徐维东, 刘波, 黄文莹. 绿色信贷指引对重污染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影响[J]. 华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 26(1): 42-62.
- [18] 王育宝, 潘慧媛, 甄俊杰. ESG 与能源技术创新偏好: 基于中国 A 股重污染行业的证据[J]. 干旱区资源与环境, 2025, 39(11): 10-20.
- [19] 徐张洋, 金贵. 上市公司 ESG 表现对城市碳排放的影响研究: 来自中国 204 个地级市的证据[J]. 财会通讯, 2025, (19): 79-83.
- [20] 李宗泽, 王跃堂, 黄旭. 强制信息披露对自愿信息披露的影响效应研究: 基于 ESG 视角[J/OL]. 南开管理评论, 1-34 [2026-03-06]. <https://link.cnki.net/urlid/12.1288.F.20251020.1009.002>.

(上接第 5 页)